

张謇故居、祖宅及其“状元府”之实地历史考察

吴仁安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一个人在一地出生之后他从不迁徙别处而是在其诞生地生活一辈子并且终老该地,此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确是有的,而且还屡见不鲜,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此种情况却会愈益减少,迨至近现代时则已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了。正是基此原因,如果我们谈到清季南通州光绪甲午状元张謇的故居、祖宅及其“状元府”等诸问题,就绝不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必须进行认真的谱牒资料研究再结合实地历史考察,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弄清问题和得到正确的答案。

【关键词】张謇;故居;祖宅;状元府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5)02-0051-06

1985年我率领我院政教系学生赴南通市搞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活动时曾采访过张謇的嫡孙女张柔武女士(张謇独子张孝若先生的二女儿,时任南通市政协副主席),她不仅为我们师生讲解了乃祖状元公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一生,还热情地亲自带领我们参观了南通市内的“状元府”。回校后我撰写了一篇《清季南通州光绪甲午状元张謇“夺魁”小考》,此文在敝校《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内部刊物)披露问世后,又先后被江西的《上饶师专学报》、山西《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和沪上的《上海滩》杂志等高校学报和人文刊物全文转载,社会影响较大,这就激发了笔者对张謇其人其事作深入研究的兴趣。但若要做深入研究,则应从了解张謇的故里祖宅、故居及其“状元府”等入手,而这又必须先行研究张謇的身世和家族史。为此,日后我曾经沉潜在上海图书馆研究张謇有关的档案资料多时,特别是在2009年上半年我在通州市侨居生活的那段日子又经常到我侨居寓所附近的通州市图书馆、通州市档案馆以及距离寓所不太远的南通市图书馆等处查阅有关张謇的文史资料。根据《通州张氏宗谱》记载:张謇的远祖居住在长江南岸的江苏省常熟县。元末,张氏远祖张建(字惟贤)因避兵乱由常熟土竹山渡江北迁至通州的金沙场,是为迁通州张氏家族的第一世祖。下传二代,至张氏

三世祖有堂兄弟计十人,在金沙场西边的金西三姓街(张、季、王三大姓)建立家园,此即当年通州著名的“十张园”。张氏后裔不断繁衍,后有迁徙石港的,也有迁往刘桥等地的。张謇这一系的第十一世祖之前究竟是哪一代、在何时由金西三姓街迁往石港的,谱牒上并无明文记载。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张謇的高祖张元臣(张氏十二世祖)、曾祖张文奎(张氏十三世祖)又从石港迁入金沙东五里庙河南头总。清代嘉庆年间,由于家境困难,张謇的祖父张朝彦阖家迁到金沙后又再迁居通州的西亭镇。道光年间,张謇之父张彭年又奉乃父张朝彦之命携带娇妻迁到海门的常乐镇居住以便侍奉彭年的外祖父吴圣樛老夫妇。1922年,金西三姓街张氏修族谱,其辈份行字,前取《诗经》中“昭兹来许,绳其祖武”八个字,张謇又取《尚书》中“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八字为续。

为什么张謇之父张彭年要从通州西亭镇迁往海门常乐镇?这里有着张謇家族史中一段小小的插曲应该补叙。原来张謇的祖父张朝彦,在他八岁时就死了父亲,家中兄弟中又数他最幼小。张朝彦16岁时又死了母亲,从此更无人来管束他,于是他成了一个吃喝嫖赌、胡天胡地的“问题少年”。其兄长们早已分家住在离老家较远的余中镇一带,根本谈不上对这个幼弟有什么帮助。倒是张朝彦的一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吴仁安(1940—),男,上海人,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史。

位嫡亲姐姐值此关键时刻竟然丧心病狂地主使一帮“下三滥”与幼弟张朝彦玩弄当时通海地区一种叫做“笃子糊”的纸牌赌博,通过这种赌博方式把分到张朝彦手上的一笔家产全部抢到她自己手中。其后倾家荡产、形同乞丐的张朝彦,多亏了一位好心人吴圣揆的收留,才不致挨饿挨冻。原籍江苏东台县的吴圣揆,其时正在通州金沙经营一个小瓷货店兼卖杂货,后来他又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张朝彦,这样张朝彦就入赘当了“上门女婿”。通海地区有一句谚语云:“招女婿,看把戏。”日子相处久了,翁婿之间难免不产生一些摩擦。好在吴圣揆是位识时务、顾大局的厚道老丈,他豁达大度地同意了女婿的要求,让张朝彦携带妻儿搬到通州西亭镇生活,吴圣揆老俩口则迁居海门县的常乐镇。

谚云:“浪子回头金不换。”搬到通州西亭后,已有阅世经验的回头浪子张朝彦,去掉许多坏习气,转变成了一位勤俭持家的能人。全家在他带领下辛勤劳作,又全家上下节衣缩食地积累资金盖起了新屋,生活日益富裕起来。不久,张彭年(朝彦长子,张謇之父)则又遵奉张朝彦之命率领新婚妻子由通州西亭沿着运盐河摇着小船顺流东去,来到了海门县常乐镇,以待奉年迈体衰的吴圣揆(张朝彦的岳父,张彭年的外祖父)夫妇俩老。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张朝彦家的日子蒸蒸日上之时,朝彦的小儿子(张彭年之弟)却失手打死了人,被抓进了监狱。为了救出这个小儿子,张朝彦只得忍痛把新盖的房屋抵债借贷,结果又一次倾家荡产。还是年迈又慈善的吴圣揆爱孙心切,他实在不忍看到在常乐镇已经当家的长孙张彭年为了帮助其父张朝彦还债而太劳累,毅然把包括其女婿在内的通州西亭镇张朝彦全家人都召回到了海门常乐镇共同生活。清朝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五月廿五日,张謇就诞生在海门常乐镇。那时张謇的外曾祖父吴圣揆夫妇、祖父张朝彦都早已去世多年了。但自张謇懂事之日起,他就听到父亲张彭年教育他:他们张氏家族的家、店、田地等等都是外曾祖父吴圣揆老人留下来的,张謇的生母金氏也是由外曾祖母看中,再命其祖父(张朝彦)、祖母(吴氏)替父亲(张彭年)聘娶的。简而言之,吴圣揆老人夫妇是他们张家的大恩人。

明白了上述张謇的身世和家族简史,就比较容易谈论张謇的祖宅、故居及其“状元府”等问题了。张謇于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二十五日诞生于海门县常乐镇,并在常乐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在14岁至18岁在通州西亭祖宅,从业

师宋紫卿读书。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在故里常乐镇老宅营建“柳西草堂”。1903年张謇在故里常乐镇老宅西边建成新宅,1915年南通州城内濠河畔的“濠南别业”落成,张謇晚年则长居南通城内直至逝世。

张謇一生居住处甚多,现在可以被称为“张謇故居”之处起码有四个地方:海门常乐镇故里老宅、通州西亭镇祖宅、南通市的“濠南别业”和“濠阳小筑”。若将张謇曾经居住之处都称之为张謇故居的话,则他的故居之处远不止上述四个地方了。例如,在南通还有狼山北麓的“林溪精舍”、军山脚下的“东奥山庄”和黄泥山北麓的“西山村庐”等等。但是,张謇生前从来都是将海门常乐镇视为自己的故里,南通的住宅尽管豪华气派,但却只能称之为“别业”、“小筑”、“村庐”等。至于那通州西亭老宅,则应称为“张謇祖宅”了。

为了对张謇故里常乐镇的故居、通州西亭镇的祖宅和金西乡的祖庙及张氏宗祠等所在、建筑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答案,我曾数度来往于海门常乐镇、通州西亭镇和通州金西乡“三姓街”遗址等地进行必要的实地考察。

首先,谈谈张謇的通州西亭的“祖宅”。张謇晚年,有一次在外地办事归程中途经西亭镇,曾赋《经通州西亭杂感》诗,其中云:“桥南大宅旧名庄,廿五年前杜牧狂,客自不来人不待,碧桃花底几残阳。”从中可见他对祖宅深深的眷恋。这也激发笔者前往西亭访古寻踪的迫切之情。公元2009年5月和2011年12月,我曾先后两次去位于通州市西的西亭镇对“张謇祖宅”等进行实地历史考察。

沧海桑田,世事变化很大,西亭旧貌已变,不见了当年张謇途经西亭时那种“市河小阁矮阑支”的水乡风景,但西亭老街却依然存在,在街角转弯处,便是那一家现在通海地区已颇为著名的西亭脆饼老店铺,当年状元公张謇为该店题写“福隆茂”店匾。街后即是那条对张氏家族来说颇为熟悉的流淌了数世纪的运盐河。清代道光年间,是张謇的祖父张朝彦带了妻子吴氏摇着小船由运盐河从金沙镇来到西亭古镇的。多年之后,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朝彦长子)则又摇着小船带了妻子金氏自运盐河顺流东去,自西亭去了海门的常乐镇,以待奉彭年的外祖父吴圣揆老夫妇双亲。笔者到了西亭古镇,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西行大约200米左右,在老街尽头,一排斑驳陆离的那种通海地区常见的砖木结构传统老房子呈现在眼前,这就是张謇的祖居老宅了。虚心求教了当地一些上了年岁的土著老居

民,听他们介绍,张謇家族几经沉浮,故宅几番易主,房屋也几度翻建,现存的房屋是在民国年间由张謇在事业有成之后就旧址重建而成的,当时西亭人把它称之为“张公馆”。据西亭土著老居民介绍,当年的“张公馆”曾有前后三进,屋宇高大、院落宽敞,花木扶疏,正厅高悬着“敦睦堂”匾,在当地是颇为著名的高档楼宇院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年名闻遐迩的“张公馆”至今则已存眼前这一排极其普通的五开间前屋了。在张謇祖宅的东侧,便是状元公张謇青年时代的读书处(即宋先生家宅,张謇的启蒙老师宋蓬山便是该宋宅的主人)。宋蓬山曾应张謇之父张彭年的邀请到海门常乐镇授课,并多次带领学生张謇来到这里。在宋蓬山故世后,张謇又来到西亭镇跟随宋蓬山的侄子宋紫卿读书,他住在西亭前后计有四年多。

其次,谈谈通州金西乡的张謇家的祖庙与张氏总宗祠。

据文史资料记载,海门常乐镇、通州金西三姓街、金沙东五里庙(又名瞿家园)这三地都有通州张氏的家庙或者宗祠,金西乡的宗祠则是通州张氏总的宗祠(由张氏迁通州三世祖时建。它自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癸丑到泰昌元年(1620年)全部建成东三进宗祠、西四进家庙,至今两棵高十米左右的银杏古树依然屹立此所宗祠园内)。离开了西亭古镇,我又几次转车,历经周折而终于来到了位于西亭之南的金西乡,那里有张謇的祖庙和通州张氏的总宗祠。公元1922年,张謇在张氏总宗祠旁兴建张氏小学,并以田养学,张氏子弟均免交学费入校读书。如今这所张氏小学已是通州金西乡中心小学,张家祖祠则成为学校的文艺活动室了。比起西亭镇上的“张謇祖宅”,金西乡的张謇祖庙和张氏总宗祠却要幸运得多了。经过学校的精心呵护和维修,它们至今都保存完好,旧貌未变。张謇考中状元的那年(清季光绪甲午年),他返乡祭祖,由其亲笔手书的“状元及第”匾至今依旧安放其间,则又使这所通州农村乡间学校的底蕴增添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祠堂旁边两株经历了三百多年沧桑的银杏古树也依然屹立园内,这又仿佛在激励着莘莘学子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再次,谈谈张謇故里海门常乐镇上位于镇东的“海门张謇纪念馆”、位于镇西的“张謇故居”及其“状元府”。

当我们谈到张謇故里的故居及其“状元府”,自然而然要提到海门的常乐镇。这是由于张謇于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五月二十五日即诞生于

海门的常乐镇,并且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故张謇在生前他一直将常乐镇视为自己的乡梓故里。但是,张謇故里的故居究竟在常乐镇的何处,位于镇东还是镇西?这确是需要认真考察、费心思量的。2009年6月初的一个晴朗早晨,我由通州侨居寓所出发乘上开往吕四港镇的公交车东行,到达货隆镇即下车,再在该镇转乘自东灶港镇开往海门县城的公交车南行。如此二程合并大约共费时两个半小时,我在该日上午九点多,终于到达了思念多时的张謇故里——海门常乐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常乐古镇并非如我想象中那样古色古香的明清古镇,它既没有青石铺就的古街,亦无如同“林家铺子”那种格式的商铺,街上则更少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行人或游客,说它是著名古镇(如同上海文艺出版社版行的《南通风情》等书籍或其它有关文章所说),倒不如说它是个不太景气的乡村市集更为贴切。常乐镇位于一条沥青公路(往北可到四甲镇、货隆镇等地,往南可达三厂镇、海门县城等地)线上,人们一下公交车,抬眼即可看到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街口屹立着一座高大、气派的石牌坊,在该石牌坊顶端正中石梁上刻有“状元故里”四个斗大的篆字。这座街口的石牌坊它座东面西,这使得许多由外地初次来访常乐镇张謇故居的游客,往往自然而然地会顺着“状元故里”的导向,由街口的石坊大门走进,再沿着街道往东漫步,我当然也不例外。大约东行数百米之遥,便到了由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民盟中央主席)、经济学家费孝通教授题写馆名的《海门市张謇纪念馆》。该纪念馆座北朝南,我到达馆前时早已超过了开馆时间,但纪念馆的大门尚未开启。当时纪念馆大门前聚集了十来位外地来的男女游客,其中有五、六人可能是我的老乡上海游客(这从他们对早已超过开馆时间,但仍旧馆门紧闭的做法而满嘴牢骚话中可知)。好不容易挨到了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才见到那位掌握纪念馆钥匙兼职馆内小卖部售货员的黑壮健妇姗姗来迟,她不慌不忙地掏出钥匙为我们众游客开启了馆门,放我们鱼贯而入。张謇故里常乐镇上的这座“海门市张謇纪念馆”占地33亩,由门厅、张謇塑像、张謇史料陈列室、碑亭、张謇故居复原等组成。纪念馆主体建筑是其中的“张謇史料室”,它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分为图片史料陈列和实物陈列两大部分,图片史料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张謇的业绩,实物则均为常乐镇当地征集到的张謇遗物。该陈列室东侧是复原的张謇故居,陈列有张謇故居早年使用的桌、椅、橱、箱等家具、日用品

以及张謇家庙的供桌、祭器等。而在碑亭之内则树立着“张公故里祠堂碑”，该碑叙述了张謇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业绩，也记录了建造此“张公祠”的过程，由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韩紫石先生及南通市的各界社会名流 40 多人发起树立，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据说，曾有游客误将上述“张公祠”当作张氏家庙，这大概情有可原。但在张公祠内有海门市人民政府所立的碑，碑上刻的竟是“张謇故居”，据说这是为了宣传张謇而制造的“亮点”。这就很有可能起到“误导”的不良作用。而正是由于上述公路旁、街道口那座屹立的“状元故里”石碑坊在方向上的误导，在纪念馆内有那复原的“张謇故居”众多张家遗物展品的陈列，特别是上述那个为宣传张謇而制造的“亮点”，由于这些种种因素，这就往往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初次到常乐镇来访的外地游客要误认为此“张謇纪念馆”就是张謇故里常乐镇的“张謇故居”了。不是吗？那天我在纪念馆参观结束步出馆门时，沿着街道往西走向公路，在路上听到有位外地来的女游客（就是上述聚集纪念馆门前等待开启馆门的五、六位上海游客中的一位）不无得意地说：“这两天真的很开心，昨天上午在南通的狼山看到了唐初大诗人骆宾王的坟墓、下午参观了南通市区濠河之畔张謇建造的濠南别墅，今天则又游历了常乐镇上的张謇故居，这两天收获真是太大了！”但随即我又听到了较为沉稳的男中音的另类说法，他正在颇有礼貌地纠正其身旁那位女游客之言：“你的判断不对，这里是张謇纪念馆，它根本不是什么张謇故居。这个纪念馆的原址是‘张謇故里祠堂’，而此‘张公祠’的前身则是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关帝庙。所以，刚才你们参观的纪念馆并不是张謇故居。另外，原来的张謇故居也不在镇东而是在镇西的颐生酒厂这一带，但这片张氏民宅房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扩建颐生酒厂而绝大部分都被拆除了！”我回首一看，发现讲话者是一位六、七十岁上了年纪的老者，他操着一口“沙地人”语音，估计极有可能这是位海门常乐镇土著居民，并从其文绉绉而颇有礼数的言行，则又可知他可能是位对当地历史文化知之甚多的文化人士，故很想同他聊聊，向他请教一些诸如关于常乐镇上的“张謇故居”、“状元府”等问题。但他当时看到附近公路上正有一辆公交车自北向南缓缓驶来，便有礼地婉言谢绝了我的邀请，说是其已经同他人约好要在海门县城一起处理某事，他说罢就匆忙地赶去公路上的车站乘车南下去海门县城了。

上述那位常乐镇土著老者讲的那番关于“这个

张謇纪念馆并不是张謇故居”的话，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在动身去常乐镇实地考察之前，我已查阅了许多关于张謇身世和家族史的文史资料，对于张謇故居及其“状元府”等问题做过充分的案头工作。根据上述研究可知，海门常乐镇上那座“海门市张謇纪念馆”的原址是建于民国时期的张謇故里祠堂。1936 年 10 月，在张謇逝世十周年之际，常乐镇的张謇故里百姓为缅怀张謇不朽的业绩，利用常乐镇东市的那座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关帝庙建筑物改建为“张公故里祠堂”，陈列张謇遗物以供各界人士和故乡人民瞻仰。迨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张公故里祠堂”建筑被拆除，唯有其中的《张公故里祠堂碑》及门前的那对石狮子还保存完好。1985 年 10 月，海门市与常乐镇人民政府在上述“张公祠”原址上建造“张謇史料陈列室”。在 1995 年，“张謇史料陈列室”进一步扩建，并于 1998 年正式扩建成“海门市张謇纪念馆”，而由当时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教授题写馆名。由此看来，这“张謇纪念馆”确实不是常乐镇上的“张謇故居”了。

在常乐镇公路旁一家简易餐厅用过午餐，我即穿越南北走向的沥青公路，沿着一条不起波澜的小河西行前去张謇创办的颐生酒厂一带实地考察传说中的张謇故里常乐镇西的“张謇故居”了。张謇故居应该位于海门市常乐镇西首，这是有文献记载的，传主张謇在其《啬翁自订年谱》开首即通俗明白地说他自己“生于海门常乐镇今敦裕堂前进之西屋”。敦裕堂是常乐镇上张氏旧宅的中厅，现在它早已被拆除了。张謇的父亲张彭年（张朝彦长子，迁通州张氏十五世祖）产有五子：张誉、张謇（早夭）、张警、张謇、张警，未来的“状元公”张謇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张謇诞生时：“先君（张彭年）始所居瓦屋五间，草屋三间耳”（见《张季直九录》“述训”）。但在通州的西亭镇，张彭年则还有一份房产，那是他在同治九年（1870 年）向他人贷款从西亭周姓人家赎回来的祖宅。然而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由于发生了张謇的“冒籍”案件，耗费浩大，虽然历时三年总算了结，但是张家为此已经负债累累、不堪重负，于是张彭年的长子张誉提出分家：“伯兄（大哥张誉）求先君（张彭年）析居，产物悉均分”（见《啬翁自订年谱》）。分家后，老大张誉、老五张警居通州西亭，张謇与他同母所生的胞兄三哥张警则仍居海门常乐镇。张警是位重手足亲情、心地善良的大好兄长，他在危难之时与四弟张謇共渡难关，兄弟俩依然同住一宅，而且在张謇“冒籍案”中所欠的大笔债务由他和乃弟张謇两人来共同承担。

张彭年诸子分家后,张謇居住常乐镇西张氏老宅西厢屋三间,张謇称之为“草堂”。农历新年一过,张謇便应原来的通州知州、后来又调任江宁发审局委员的“恩师”孙云锦之邀,离开常乐故里至江宁谋生,从此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直至18年后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二月,张謇才于常乐故里的张氏老宅原址翻建新屋,“十一月八日,西厢开工”,“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六日,柳西草堂动工”(见《张謇日记》)。张謇日记中所说的“柳西草堂”位于张謇故里常乐镇西张氏老宅的西南,它的落成,使张謇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但它也只是当时海门一带普通的农居而已。张謇在清季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夺魁”之后,由于他致力于创办实业与教育,常年在外奔波,很少在其故里常乐镇西故居老宅居住。尽管多年以后张謇已经功成名就,而他的故里住宅却迟迟没有动工改造或者兴建新宅。所谓的“状元府”,实际上是在张謇考中状元十年之后才动工兴建的。有人撰文称:张謇大魁天下后,清廷拨款在他的故里常乐镇上兴建了“状元府”云云(上海文艺出版社版行《南通风情》第141页),这只能是文章作者的想当然而已。至于1985年初夏我率领敝校政教系八四级学生到南通市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实践之时,由张謇的嫡孙女张柔武女士(张謇独子张孝若先生的二女儿,时任南通市政协副主席)亲自带领我们师生在南通市内参观的那座所谓的“状元府”,也只不过是张謇在1915年才在南通市濠河畔落成并居住过的“濠南别业”,但张謇本人也说它是“别业”而并非“状元府”。其实,所谓的张謇“状元府”云云,它也只是当年张謇故里海门常乐镇一带民间的说法,它是指张謇1903年在故里常乐镇兴建的新宅。这座新宅(即所谓的“状元府”)位于常乐镇张氏旧宅西侧,它与旧宅仅是一沟之隔。它于清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动工,该工程图由张謇亲自制定。但开工不久,张謇便应邀东渡日本考察(参加日本举办的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先后到过长崎、马关、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横滨、札幌等20多个城市,共计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坚持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对参观的日本国35处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进行比较和分析,回国后他撰写了三万字左右的《癸卯东游日记》,直至次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七月初五日才回到故里常乐镇,这时新宅已将近完工。在新宅建造过程中,张謇本人并没在现场,故该建造新宅的工程是“由室人任督察之役”(见《张謇日记》,“室人”者即指张謇

的元配夫人徐氏)。1903年(光绪癸卯年)八月十八日,张謇“移居西宅(即所谓“状元府”的新宅),以东宅归叔兄(即张謇的二哥张謇)”(见《啬翁自订年谱》)。从此,“状元公”张謇才真正拥有一座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宅园“状元府”了。至于南通“濠南别业”的营建,那是在张謇故里常乐镇西的“状元府”造成12年后的事了。

根据文史资料记载,在张謇故里常乐镇西营建的这座新宅“状元府”为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宅园建筑,前后计有六进约1000多平方米,沿中轴线依次为贮藏室、正厅(称“尊素堂”)、中厅、屏门、内厅和后堂。状元府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尊素堂”,中为五开间大厅,两侧是花厅和轿厅,前附卷棚式通廊。位于尊素堂后面中厅的西侧便是张謇的书房,亦即张謇回到故里常乐镇新宅后最喜爱之处而将它称之为“啬庵”的地方,他爱在这“啬庵”读书写作或者思考人生。此宅园的大门位于东南侧,大门前高悬着张謇最为敬重的恩师翁同龢所题的“扶海垞”匾额。进入宅门,往西是张謇所居新宅“状元府”,往东则是张謇胞兄三哥张謇所居的张氏“老宅”。

在常乐镇西的张氏“老宅”东侧有“张氏家庙吴氏附祠”,它是张謇根据其父张彭年的临终遗言而于光绪二十二年建立的。因为张謇、张謇同胞兄弟自幼承继父教,他们都深知海门常乐镇的店铺、田地、老宅,它们都是由外曾祖父吴圣揆老人遗留下来的产业,故将吴氏宗祠附于张氏家庙,以示不忘吴氏之恩惠也。张謇为家庙题联云:“赖吴存张,兼祀吴以报吴,古者致敬发情,斯为礼意;惟祖肇考,敢忘祖而忝祖,今日力田奉祭,犹是农家。”而在张氏祠堂之前,临街大路上则树立“乐善好施”石碑坊一座,它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江苏巡抚鹿传霖疏闻于朝,乞准张謇张謇为其故父四品封职张彭年、故母金氏在原籍地方自行建坊,给‘乐善好施’字,以示旌奖”(见张謇《建乐善好施坊恭记》,该石刻现存海门常乐镇上“张謇纪念馆”)。综上所述,张謇故里海门常乐镇上的所谓“张謇故居”,它既可指该镇西首的张氏老宅(张謇在清季咸丰年间即诞生在这“老宅”之中。在张氏诸兄弟分家之后,张謇又与其三哥张謇同居此老宅内,直至他的新宅落成之后才迁出“老宅”),也可以指是张謇在1903年落成的新宅(亦即常乐镇上当年居民津津乐道的所谓张氏“状元府”的那所邸宅)。

在张謇新宅的西侧,张謇后来又创办了颐生酒厂。该厂最初创建于张氏垦牧区海复镇(今属启东),但因1903年海潮袭击,厂基被毁,便在1905年

迁至海门常乐镇西首。这样,于常乐镇之西,在纵 100 多米、横 200 多米的范围之内,形成了一片规模宏大的张謇家族建筑群。但在张謇于 1926 年 8 月 24 日(农历七月十七日)去世后,张謇后人多移居南通,故里常乐镇则仅留下数人看守而已。解放后,张氏家产经过当时海门县财政局登记后由公产股代管。至 1954 年,由于颐生酒厂的发展需要,张謇、张簪兄弟宅园均被拆除改建为新厂区,只有张氏老宅的后排一些房屋(均非张謇兄弟家属所居住宅)剩留下被改作酒厂职工宿舍。而原来张氏兄弟所建的祠堂、学校,则亦均被拆除改建为当时的海门县党校。于是,在张謇故里常乐镇西首,原是张

氏家产的敦裕堂、柳西草堂、尊素堂和扶海垞及其附属建筑物等等,统统先后消失。既然如此,那末时至今日,许多外地游客风尘仆仆地来到状元公张謇故里常乐镇上意欲一睹“张謇故居”或者“状元府”等等的风采,他们又焉能如愿以偿呢?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不知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由于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竟然制造“亮点”,移花接木地将镇东的“张謇纪念馆”指鹿为马向游人误导人成“张謇故居”,对此举措,有识之士当然也就不至于“不可思议”了。

(责任编辑:闫卫平)

The Historical Survey on Zhang Qian's Former Residence, Ancestral House, and his "House for Number One Scholar"

WU Ren-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fter a man is born, he never moves to other places, but lives in his birthplace all his life and then dies there. This case is very common in ancient China. However,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this case is increasingly reduced, and becomes rare to be seen until the modern times. For this reason, we must not just hear it from grapevine, or follow others' word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former residence, ancestral house, and his "house for the number one scholar", or other issues about Zhang Qian in Nantongzhou during Guangxu Emperor years. We must make a combination of careful researches on genealogy and historical survey. Otherwise, we cannot figure out the problems and get the right answers.

Key words: Zhang Qian; Former Residence; Ancestral House; "House for Number One Scholar"